

杰出交大人丛书

怀念汪道涵

◇上海交通大学 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序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杰出校友汪道涵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

汪道涵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受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汪道涵于1932年考入交通大学科学学院物理系，次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交大地下党的历史上留下了他积极参与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的斗争足迹。离开学校后，他和其他交大校友一样，饮水思源，时刻牵挂着培育过自己的母校，始终以满腔热情关心和支持高等教育的建设和发展。其中包括关心母校教育事业，倡导和支持闵行新校区建设；关心母校经济和管理学科的发展，重视培养管理专业急需的高端人才；先后应邀担任交通大学校友总会名誉会长、上海交通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光，他还心心念念关注着母校的发展，欣然允诺要为2006年上海交大110周年校庆录音一段话，还答应为即将出版的《上海交通大学纪事》写个序。

从青年时代直至晚年，汪道涵一直与上海交大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他对母校点点滴滴的关怀令我们感动，他的思想和精神都成为学校宝贵的人文资源，将教育和熏陶世代青年学子。

为了弘扬汪道涵精神，我们编辑出版这部《怀念汪道涵》。全书汇集

了校内外各界人士撰写的纪念文章 60 余篇,大致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记述汪道涵的生平事迹,第二类缅怀汪道涵的人格风范,第三类介绍汪道涵的战略思想,第四类叙谈两岸问题。作者大多熟悉汪老情况及其为人,他们或在汪老身边工作过,或曾与汪老有过接触,亲耳聆听过汪老的教诲。文章情真意切,内容具体生动,从不同侧面展现了这位世纪老人的业绩、追求、学养和气度。

汪道涵一生执著追求理想,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无比热忱。无论斗争如何艰巨、局势怎样复杂,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坚贞不渝,表现出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关心和爱护青年干部,尊重和爱惜知识分子,团结和凝聚各界人士;重视民生,情系百姓冷暖;关心台湾问题,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和两岸人民的福祉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汪道涵既是位资深的老革命家,又是位睿智博雅、德艺双馨的经济管理学者和台湾问题专家。他思维敏捷,视野宽广,注重战略研究,总能从世界格局、中国发展的战略高度,以辩证的思维来处理许多关乎民族和民生的问题。从他对母校建设所提出的许多中肯意见中,也闪烁着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真知灼见。每次我们去拜访汪老,他都关切地询问学校近来的发展情况,并多次谈到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人民的生活以及一流大学的定位、高校教学科研与企业的关系、全球校际交流、大学文科建设等问题,使我们获益匪浅。

汪道涵学识渊博、好学强记,这是众所周知的。他经常说起,一生最大的兴趣就是读书。他不仅自己酷爱阅读,有着勤学深究、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还经常把好书、新书推荐给周围的同志,和大家共同探讨研究。2005 年 1 月和 12 月,我们两次赴瑞金医院探望汪老,他都给我们介绍《美国教育史》,并叮嘱说:“现在办大学面临的是与国外著名大学的竞争,要了解它们的发展历史,大学要走在社会和科技的前面。”

汪道涵为人谦虚平和,温文尔雅,拥有博大宽广的胸襟。凡与汪老有过接触的同志都知道,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在他身上决没有丝毫官架子。他淡泊名利,永远低调处理自己的一切事情,具

有高尚的人格魅力。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只是新四军的一个老兵，一个受党教育的很平常的老兵。”

倍受我们敬仰的汪道涵学长永远地离去了，但他的丰功伟绩，他的高风亮节，还有他的音容笑貌将长留在人间，他那不朽的精神遗产永远值得我们敬慕和弘扬。我们要以汪老的关怀和勉励为动力，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伟大实践中做出更好的成绩，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汪老的缅怀之情。

谨以此书纪念汪道涵逝世一周年！

A calligraphic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ree characters: '马德军' (Ma Dejun).

2006年12月

目 录

Contents

汪道涵同志生平	(1)
高山仰止 学人敬慕——怀念敬爱的老学长汪道涵	王宗光 (4)
“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事略	冯 都 (18)
海峡两岸关系的牵线人汪道涵	王明江 (22)
心怀和平愿 憾未跨海行	秦武平 (30)
汪老风范 两岸同怀	陆一波 (33)
未竟遗志 期待后人	邵 岭 (36)
汪道涵:远见穿越艰难时世	汪 伟 (39)
智者汪道涵	徐琳玲等 (48)
读书人汪道涵	杨艳萍 (54)
汪道涵与我促膝谈心	于光远 (62)
在思想的火炬下勉力前行——纪念汪道涵市长	周汉民 (64)
汪老二三事	葛剑雄 (68)
努力学做道涵同志那样高明的领导	夏禹龙 (71)
尊重知识 爱惜人才——回忆汪道涵先生的领导风格	章嘉琳 (74)
报国有心 爱国无限——记老共产党员汪道涵对我的 教诲	王小强 (77)
汪道涵市长的学者风度	范祖德 (81)

难忘的病床嘱咐	陈 泓 (87)
忆良师汪道涵	陈元麟 (90)
刚柔相济 激情四溢——深情忆述汪道涵往事	许晓青 (93)
上海“台胞之家”忆汪老	许晓青 王 茜 (95)
“我不赞成突出个人”——汪老最后一次改稿记	杨金志 (97)
专访前,老人一再致歉	袁 飞 (99)
善于听完别人最后一句话	肖春飞等 (101)
心怀天地 情系中华——追思汪老的高风亮节	杨洁勉 (104)
哲人仙逝 风范长存——追忆汪老二三事	黄嘉树 (107)
心系天下 鞠躬尽瘁——深情缅怀汪老	周建明 (109)
儒雅倜傥 厚德载物——怀念汪道涵先生	程孟辉 (111)
书交情深——忆汪道涵同志二三事	鲍寿柏 (114)
汪老与《辞海》	巢 峰 (118)
2005,最后的告别——怀念本报知音、最可敬的书友	
汪道涵	《文汇读书周报》编辑部 (120)
书店巧遇	李济生 (122)
汪道涵学长激励我们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纪念	
汪道涵学长逝世一周年	谢绳武 (124)
我国城市发展与城市研究的卓越引领者	王茂林 (130)
怀念上海市老市长汪道涵	贺彭年 (138)
情系两岸的赤子之心 超越时空的战略思维——悼念、	
追思、学习汪老	黄仁伟 (144)
胸怀全局 心贴人民——怀念浦东开发奠基人汪道涵	
老市长	於品浩 (147)
先生风范 山高水长——忆道涵同志儒雅学者的	
政治胸怀	彭运鸮 (153)
道涵同志在解决上海房屋、土地难题上的睿智决策	蒋如高 (163)
主政上海建树多	茅 杰 (167)
汪道涵同志与出版工作	陈 昕 (170)

儒雅智者 广阔胸襟——部分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回忆	
汪道涵	卫 蔚 (175)
长者风范 智者气度——追忆与汪老交往的几个	
片断	邢广程 (179)
怀念汪道涵先生	温铁军 (183)
长者风范 后世楷模——忆汪道涵会长二三事	王在希 (186)
缅怀敬爱的汪道涵会长	章念驰 (190)
忆念汪老 激扬精神	俞新天 (193)
德高望重 风范长存	许世铨 (196)
审时度势 理性思考——缅怀汪道涵对台湾研究	
工作的重视与推动	严安林 (199)
汪辜绝唱 明月不沉	连锦添 (202)
“重要的历史性的一步”——回忆“汪辜会谈”	
采访印象	谈小薇 (204)
第二次“汪辜会晤”采访印象	李玮颖 (207)
汪道涵的微笑	钱勤发 (209)
汪老已乘黄鹤去 两岸犹闻破冰声	《南方都市报》编辑部 (211)
化解台湾民众的历史心结——忆汪道涵先生之于两岸	
关系点滴	辛 旗 (214)
汪辜佳话 终留遗憾	贺莉丹 (220)
汪老仁者之风长存	施子清 (229)
哲人西去 来者可追	褚静涛 (231)
“九二共识”奠定基础 “汪辜会谈”成绝响	《大公报》 (234)
汪老的最后时光——迎连宋为和统尽心尽力	郑旭荣 (237)
此情留待可追忆	杨 楠 (239)
汪老仙逝 两岸同悲	潘锡堂 (241)
后记	(243)

汪道涵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原中顾委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上海市原市长汪道涵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12月24日7时12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

汪道涵同志，原名汪导淮，1915年3月27日出生，安徽嘉山人。早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1933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被捕，与组织失去联系。1934年至1936年，在安徽明光中学、泗县中学教书。1937年初到上海光华大学读书，同年冬率全家及进步青年30余人奔赴延安。1938年7月重新入党。先后参加新四军四支队、五支队，任战地服务团团团长、先遣队政委、来安办事处处长、盱眙办事处处长。1940年2月起任淮南嘉山县县长、县委书记，淮南行署副主任、党团副书记，淮南津浦路东专员公署专员、党团书记，淮南地委财经部部长、行署副主任。1945年10月起任苏皖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建设厅副厅长，华中军区、山东军区军工部部长、政委，胶东区行署代主任，安徽省财办主任。1949年5月起先后任杭州市军管会副主任兼财经部部长，浙江省财办副主任、省财政厅厅长兼商业厅厅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52年11月至1964年7月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64年8月至1966年夏任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8年夏至1980年7月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0年7月至1985年

3月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1985年3月起任上海市政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1991年12月起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

汪道涵同志是党的八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代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当选为中顾委委员。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汪道涵同志为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奋斗了七十多个春秋。早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参加社联等进步组织，参与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从事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和淮南行政公署党团的领导工作，为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他辗转苏皖边区和华中、山东军区，为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财政、工业等战线工作，为我国机械工业和对外经济的发展出谋划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但他仍坚信真理，坚定信念。到上海主持市政府工作后，面临经济社会事业百业待兴的艰难局面，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入调查，注重研究，善于谋划，在市委领导下，主持制定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等一系列事关上海重大发展的战略性决策。他综观国内外发展大势，先行提出了浦东开发、申办世博会、建设航运中心等重要主张和意见，积极推进国内区域经济协作，十分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为实现上海的改造和振兴，为上海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作出了突出贡献。

汪道涵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无比热忱。他关心和爱护青年干部，尊重和爱惜知识分子，团结和凝聚各界人士。他重视民生，情系百姓冷暖，着力解决上海居民的住房、交通、菜篮子等实际问题，着手规划黄浦江、苏州河环境污染整治工作，载入了上海发展的史册。1990年12月，他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对推动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汪道涵同志关心台湾问题，致力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1991年

12月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1992年起,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与中央对台工作的重大决策与部署。他始终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努力贯彻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等分裂活动。关心和热爱台湾同胞,广泛联系主张发展两岸关系、反对“台独”的台湾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推动两岸人民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1993年4月,受权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领导人举行汪辜会谈,实现了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公开接触商谈,标志着两岸关系的历史性进展,并推动了两岸事务性、经济性商谈。1998年10月,再次与海基会领导人会晤,开启了两岸政治对话。他为推动两岸谈判进程、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做出了重要努力,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受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汪道涵同志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党性强,大局意识强,创新意识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高贵品质。他博览群书,思维敏捷,视野宽广,注重战略研究,具有学者风范。他作风民主,襟怀坦荡,平易近人,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他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在患病期间,他坚强地与病魔作斗争,时刻关注党和国家的发展事业,心系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体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崇高的思想情操。

汪道涵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不朽的精神遗产,永远值得我们敬慕和弘扬。

高山仰止 学人敬慕

——怀念敬爱的老学长汪道涵

王宗光

◎ 怀念汪道涵

汪道涵于1932年考入交通大学科学学院物理系，就读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参加革命活动中止学业，进入解放区长期担任人民政府的党政领导工作。20世纪80年代后，汪道涵担任上海市市长等领导职务，其间一直关注并大力支持上海交通大学的改革与建设，为上海交大的发展倾注了许多心血。他曾先后应邀担任交通大学校友总会名誉会长、上海交通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交大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在上海交大的校园中，印记着汪老半个多世纪的足迹；在上海交大的历史上，留下了汪老不倦的思考和谆谆的教诲。交大的师生们，永远景仰汪老的学者风范和伟人品格。

从进步青年到共产主义战士

汪道涵，原名汪导淮。1932年9月，年仅18岁的他从南京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进交通大学科学学院物理系。当时的交大以骄人的办学成绩而享誉海内外，成为众多青年学子心仪向往的国内著名高等学府。校内名师荟萃，学者云集，其中曾为汪道涵授过课的物理系系主任裘维裕和化学教师徐名材，都是执教基础课程的知名教授，素以学问精湛、要求严格而著称，他们都给汪道涵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在师生们眼中，这位来自安徽的文雅青年，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他爱好阅读，善于思考，

尤其喜欢看鲁迅的文章。

一个追求光明的知识青年。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校园绝非隔绝于现实社会之外的象牙塔。此时的中国,烽火连天,国难当头。日本军国主义者先后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也激起每一位爱国学子的无比愤恨。严重的社会危机直接导致大批毕业生失业,使得青年学生深感在国民党统治下前途无望。那时很多交大学生盼望毕业后当个普通职员、教员,拿到几十块钱(银圆)的工资,或者争取考公款出国的机会。但这种机会岂是人人可以获得的?每一个有志青年都在深深地思考:民族的出路何在?国家的希望何在?青年的发展前途又在哪里呢?

汪道涵在校期间,结识了一位由唐山交大转学而来的电机工程学院一年级学生林得连,他也是充满激情的爱国青年,当时已经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1933年2月,经林得连介绍,汪道涵加入了文化界左翼群众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开始研究社会科学。每逢星期天,几位“社联”成员都在校内的工程馆开会,聚在一起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家对《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尤感兴趣。汪道涵通过学习,深刻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自己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3年3月,汪道涵在交大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林得连,与他同时入党的还有管理学院一年级学生邵震华。他入党时还举行过一个庄严的仪式,先由党支部书记约他到执信西斋二楼宿舍谈话;晚上又找到一个僻静的教室,墙上挂起一面镰刀斧头旗,在支部书记和介绍人的见证下,汪道涵面对党旗庄重宣誓。从这一刻起,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的战士。

1933年上半年,交大党支部力量较快地充实壮大,成员有学生党员和校工党员近20人。汪道涵在支部活动中非常活跃,同志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小汪”。当时党内活动主要是小组会,开展自我批评和发展党员。为加强新党员的理论学习,支部内部设立列宁学习小组,小组的活动一般放在周末,到校外比较荒凉的万国公墓或者法华寺(今徐汇区法华镇路、幸福路一带)附近,以聚餐的形式作掩护,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直

至晚年,汪道涵还常来这里散步,对陪伴他的人深情地回忆青年时代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形。

积极组织进步学生的革命活动。除小组会、列宁学习小组等党内组织生活外,党支部还以各种形式在校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团结教育进步学生。那时支部曾极力争取过一位革命的同情者——抗日爱国将领方振武之子、管理学院一年级学生方心诰。汪道涵本人和方心诰的关系很好,两人都爱好京剧。当时,每周日就有票友来学校体育馆教戏,他俩便结伴前往。汪道涵对方所学的实业管理专业很是好奇,他为此经常去找方讨教。交谈中,他常有意评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腐败,方心诰总是默默地听着。后来,因方振武在蒋介石的排挤下不得已而被迫举家流亡英国,方、汪两人才失去了联系。

1933年5月,交大学生会改选,顾文卿、林得连、汪道涵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通过公平竞选进入学生会。顾文卿主持学术部,林得连主持艺术部,汪道涵主持平民教育部,他们以合法形式进一步组织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要求上海各级党组织始终把工人运动摆在首要位置,交大党支部便积极发展工人党员。汪道涵负责办理设在学校对面的平民夜校,他从学生会里取得一笔经费,买来黑板、粉笔、纸张,通过夜校教育,不仅提高了工人的文化水平,还发展了林娟(女)、宋一民等工人加入党组织。当时,党员们经常运用写标语、散传单等形式唤起市民的爱国思想。据汪道涵晚年回忆:那时,每星期天的晚上,趁着夜深人静,大家都要上街写标语。我们两人一组,从兴国路一直到交大,兜一个圈子。就这样,“想尽一切办法做工人阶级的工作”。

由于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加上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中共上海市法南区委机关和基层党支部接连遭到破坏,交大党支部骨干成员中经常有人被抽调到社会上的地下党组织中去任职,或者因参加过于暴露的活动遭到校方开除,所以交大支部组织成员变动频繁。1933年6、7月间,支部书记顾文卿调任法南区委书记,林得连接任书记,电机工程学院二年级学生党员王骥任组织干事,汪道涵任宣传干事。7月暑期,汪道涵没有回家,调离交大担任抗日左翼团体上海反帝大同盟

(简称“反委”)法南区党团书记。此时的汪道涵,由于家庭经济来源断掉了,没有经济收入,只得靠上学节余的一点钱勉强维持生计。每天吃的是阳春面(光面),住在霞飞路(今淮海路)租借来的亭子间里,也曾一度住进设在衡山饭店附近的“反委”机关。当时,国民党派了许多特务在上海活动,经常对单身的年轻学生进行盯梢。尽管生活条件万分艰苦,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政治环境更是极其恶劣,汪道涵始终保持着革命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积极参与组织反帝爱国运动,尽一切可能在艰险的环境中为革命多做工作。担任“反委”法南区党团书记期间,按照中共江苏省委统一部署,他参与筹划组织八一示威游行活动,与沪中区委的一位同志在外滩接头联络。游行活动当天,他出任法南区方面的指挥。由于事先计划周密,且与沪中区委配合默契,此次示威游行活动顺利进行。后来,汪道涵又接受上级任务,要他参与组织欢迎反战反法西斯联盟的进步人士——法国巴比赛、英国工党领导人马莱和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瓦扬古久列等人来上海的活动,他直接参加组织了在马当路举行的欢迎巴比赛大会和在杨浦区某码头举行的欢迎马莱、瓦扬古久列大会。10月,马莱和瓦扬古久列离开上海之际,又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法国领事馆前举行欢送会,他参加了设在朱葆三路(今溪口路)指挥部的内勤工作。

不幸被捕,离开学校。1933年11月底,汪道涵在学校附近的台斯德郎路(今广元路)、姚主教路(今天平路)路口不幸遭密探逮捕,他先被带到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徐家汇分局,后又转到南市区分局。审讯中,密探提到曾经在中国领土保障大同盟见到过他,原来,那时他由组织安排曾在中国领土保障大同盟做群众工作。中国领土保障大同盟在法租界有公开的办事机关,也多次在报纸上登过广告。根据这一背景,他既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也未承认是中国领土保障大同盟的成员,只说自己是爱国青年学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看到有中国领土保障大同盟这么个机构,才顺便进去看看。一个多星期以后,他又被转到龙华警备司令部,作为政治犯被关押在丙号房内。其间多次受审讯,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爱国青年的身份,国民党当局也没有抓住他从事革命活动的任何证据。1934年1月,汪道涵经父亲保释出狱,离开上海回到了家乡。

汪道涵晚年时候常说自己是“新四军的一员老兵”，交通大学正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求学交大期间，白色恐怖下波涛暗涌的反帝爱国运动，坚定了他革命的信念，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使他从苦读寒窗、志在报国的一介书生，锻炼成长为一名轩昂磊落、忠于人民的共产主义战士。

长期经济工作实践，著名的管理学学者

汪道涵离开学校后不久，就离开家乡进入了解放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汪道涵曾担任新四军、苏皖等地区的县长、行署专员、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建设厅副厅长、财办主任、财政厅长等职务，直到新中国成立。建国后，他又先后担任了华东工业部部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0年，汪道涵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市长；1985年3月任上海市政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此后，还担任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一职。

长期经济管理工作岗位的磨炼，使他养成了学习、研究经济工作规律的习惯；为此，汪道涵曾享有“学者型领导者”和“儒官”等美誉；1985年，他还获得美国塔夫茨大学授予的公共管理学荣誉博士称号。从我们已搜集到的汪老20多篇经济管理方面的论文中，可以感受到他所具有的深厚的经济管理理论基础和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初步认识他的经济管理学术思想和经济管理工作的科学方法。我们读了汪道涵在建国初期就任华东工业部部长时的一篇报告《华东的电器制造工业》，我们还翻阅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所发表的众多的经济管理方面文章。这些文章涉及技术引进、经济协作、科技经济的协调发展、浦东开发规划、东南亚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等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和国际经济变革中所出现的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和重大社会问题，其中涉及了城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金融管理学等诸多经济学科的基本理论，从中反映出汪道涵对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许多经济理论问题的深刻思考与探索。

善于结合社会经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提出研究课题。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在政治上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前夜。而此时的社会主义经济事业正百废待兴,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各级经济部门的首要任务。作为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负责人,汪道涵坚决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积极利用国外资金,努力扩大出口的方针,就技术引进工作发表多篇文章。他针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全面分析了技术引进工作的必要性和基本原则,深刻提出了技术引进过程中的主要形式和注意事项,他要求各地、各部门一定要在事前做好可行性论证,引进项目一定要做到综合平衡、一定要提高消化吸收能力,注意引进技术与进出口贸易相结合、引进技术与科研设计开发相结合。80年代初,汪道涵担任上海市市长,他在领导上海经济建设过程中,深刻体会到上海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密不可分的经济交往与联系。这种交往与联系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可以通过中央的指令性计划予以调控,但这种调控手段此时已经表现出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诸多弊端。他在主持制定全市经济发展战略时,鲜明地提出了发展生产、扩大流通的新路子,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拓展上海与兄弟地区之间经济技术的协作与联合。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地区间协作“五项原则”,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互利互惠、坚持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科学性、强调相互学习、传递和交流技术管理经验。他就地区间技术协作与联合提出的各项原则和方法,充满了经济活力,其中有许多内容在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都得以实现。汪老从政府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更加关注国内、国际的经济发展问题,他先后就经济体制改革与法律调整、上海经济区的工作任务、长江三角洲开发等问题都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

善于从学术和理论的高度把握经济活动的本质与规律。汪道涵从自己数十年从事经济工作的体会中深知管理科学、尤其是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所以,他在管理工作中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学习西方经济理论并从未间断地从事这一方面的学术研究。还在国家拨乱反正之时,他已及时地提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理论、知识及方法来解决”,要把世界经济的研究与国内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这就需要管

理学和经营学；而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经济活动，这就需要市场学和市场预测学。汪道涵所关注的正是建立起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理论体系，为此，他付出了大量心血。他亲自组建了云集各路精兵强将的“东方研究所”；他也应聘清华、北大、复旦等国内多所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非常关心高水平经济理论和实践人才的培养，在上海交大，他不仅是著名教授，还担任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会主任，直接参与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他先后主讲过世界经济、政治经济、城市经济、经济管理等多门课程。在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他非常关注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亲手促成了全国城市经济学会的组建，并在成立大会上发表学术报告。他引经据典、联系实际，就中国的城市化特征、中国城市发展道路、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任务、研究对象和方法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观点；他所提出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发展战略、城市建设等命题至今仍然是城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他以城市经济学等理论研究为基础，于1984年4月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为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提出了“外挤、内联、改造、开发”四项原则，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经济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重视市场营销、价值工程、金融管理，是汪道涵经济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反复强调，“在现代经济中，市场就是大量商品、劳务、金融流和信息流形成的社会经济联系网络……认识和自觉地利用这些联系，适应市场、开拓市场，才能在国际、国内竞争中求得不断巩固与发展。”

善于以战略眼光敏锐地捕获经济活动中的动态和机遇，及时提出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对策。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改革一浪接着一浪，为政治、经济、科教、文化各领域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是伴随着机遇与挑战、成功与失败、探索与实践一步步走来的。汪道涵就是一位勇于站在时代前列的思考者、探索者。1986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科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文章，深入阐发了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思想，并鲜明地指出：“经济增长靠什么？第一就是靠科技。”他语重心长地一再强调，“科技与社会的关系，涉及整个历史的进程和今后的远景。”20世纪80年代，汪道涵曾